

试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

张 海 英

晏阳初(1893年-199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大陆倡导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50年代起他将改造乡村的实践积累的“定县实验”推向世界,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也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1943年,在美国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纪念集会上,晏阳初与爱因斯坦、劳伦斯、莱特、杜威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在给晏阳初的表扬状上,这样写到:

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年的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数千万不识字的人以启发他们的心智。他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的果实。

在今天,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成为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各界纷纷从城乡结构、土地制度、农民收入、义务教育等角度考察“三农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却很少把“三农问题”放进历史的长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究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解决的路径。其实,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会知道在历来靠农业立国的中国社会,历史上曾有许多先贤志士为治理、改造和建设乡村做过极大的努力和全身心的投入。晏阳初作为中国平民运动的倡导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在政治动荡,党派林立、战乱不休的社会环境中,为提高民族素质努力推进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助益。同时,发掘先贤伟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可以为现今农村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凡谈到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就必然提及定县实验。而人们对定县实验的认识大都是围绕着平民教育的具体内容——四大教育来展开的。对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是如何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和推行的这一问题却谈及甚少。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探讨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项社会改造活动,它是如何突破学术研究的局限去进行政治改革尝试的。

一, 平民教育与30年代的中国政治

定县实验从1924年起步,到1932年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内,晏阳初率领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所做的努力都是自下而上的,也是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很少与政府之间建立联系。因为,最初他认为不用政治的力量,单从学术的角度对平民教育方法,方式进行探究,制定出制度,建立起模范县,再用演示的方式就可以将经过实验所获得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制度,方法在定县推广,乃至推广到全国,最终实现改造乡村的愿望。即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提高乡

村平民的素质，从而促使政治的变革。为此，这一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以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教育制度的构建为重心的。然而他的“学术力量”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使晏阳初逐步认识到平民教育的推进必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造同步进行。

固然，平教会通过以村、区、县为单位的研究实验，明确了用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具体目标、方法和制度。并通过平民学校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深悟乡建理念同时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乡建骨干。但晏阳初及同仁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推广和实施的工作？无疑，这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的关键问题。显然，要进行推广和实施的工作，仅靠自下而上的学术性的工作和教育培训工作是不够的。

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政治的功能，应在于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以保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的动员程度，提高社会资源的运用和分配能力，把随着知识增长、技术进步而出现的各种经济可能性迅速变为现实。如果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政治没有体现出以上功能，则再好的社会改造计划也是无法实施的。无疑，社会改造需要教育与建设，但如没有好的政治，将是一事无成的。想不用政治的力量，就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成熟的。

在实际工作当中晏阳初已省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这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之处。因此，此时的晏阳初，已不仅仅注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考虑改造社会的问题，亦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从识字教育到乡村教育，进而又把县政改革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步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以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运作方式到此阶段已开始趋于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县政改革作为一项非暴力的社会改良运动，并非这些知识份子一厢情愿的事情。它若没有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则举步为艰。

例如，县政改革前的调查研究工作，就需要政府的配合。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之前，先进行调查工作，这是晏阳初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改革县政也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的。通过调查，找出问题后，再考虑解决的方法。而要对政府的工作展开调查研究，没有政府机关的支持与合作是难以进行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平民教育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

在把握国家统治权力的政府在国家政治中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的中国，除暴力革命外，任何的社会改良行为，若没有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是难以推进的。正所谓：社会改革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配合。30年代初这种配合有了契合点——国民政府要做建设的工作，以晏阳初为首的社会精英要做改革的尝试。可以说“县政改革”是这两者契合的结果。

进行北伐，国民党只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之后，到1932年，虽然有一系列计划、法规被制定出来，有许多新的机构被设置，但实际上即无政治的改革，也无经济的建设。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到了民国15年（1926年）北伐，随着军事胜利，我们已在国内又造成一种革命的新时势，可是我们仍旧踏了辛亥革命的覆辙，接着军事胜利，而无政治的改革，即不能乘势将旧的社会改造成一个新的社会以继之。所以几年来，我们革命的成绩，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到今天已显然证实我们几年以来的革命又失败了！”²⁾

当时，在国民党内有这样的认识：这种革命和建设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内派别意见很多，甚至导致了数场内战，国家无法统一。加之，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势力和抵抗苏联、日本的侵略，在军

事武力上投入极多，又有以往歉下的大量外债要偿还，使财政上一直存在深刻的困难，导致国民党政府缺乏推行进一步革命和建设的广泛政治力量与经济基础。但是，更为基本的原因则是“民族精神”的丧失。因而，国民政府有意继续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实行所谓“第二期革命”。其急务一方面在执行“安内攘外”政策以统一国家。同时，要着重树立民族精神，以奠定救国建国的基础。

30年代初期，新组建的国民政府表现出欲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愿望。特别是开始从政府的角度重视民众教育工作。1930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首次把开展民众教育问题列入国家的法规当中，表现出为“训政建国”而推进民众教育的愿望。鉴于此，晏阳初开始考虑与政府的配合与合作。并且，从1931年起，他就开始积极去说服蒋介石政府，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切实地对民众教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定县实验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也开始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1931年春，蒋介石邀请晏阳初到奉化县溪口镇参观，并指导蒋氏故里的乡村建设。晏随后返抵南京，与蒋介石夫妇就平民教育的意义进行长谈，深得蒋氏夫妇的赞赏，当即决定从溪口镇选派人员赴定县接受训练。随后，晏又被邀请到中央军校高级班作平民教育专题的演讲，蒋介石亲临听讲后，在致词中赞许定县实验，称平教会所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并决定选派教官赴定县受训¹⁾。可见，蒋介石不但赞许定县实验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认为定县经验可以在“训政建国”中发挥作用，有意将平民教育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计划当中去。

1932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所谓“民族复兴”，主要是“复兴民族精神”，即注重民众的心理建设。蒋介石强调，“民族精神”是“民族道德”的表现，而所谓“民族道德”，就是“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³⁾。他说：建立民族精神（道德）不是恢复古老的传统，而是要让传统道德的内容“随着潮流，加以整理，以求发扬光大，养成功一个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才能养成功一个新中国的民族性”⁴⁾。

当时，蒋介石如此强调民众的心理建设，是基于他对国情的诊断。他在1935年（民国24年）11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中说：“按我国人民当前最大的病征，曰散，曰愚，曰贫，曰弱。亦惟其既散且愚，遂致民力不能聚，生产不能增，灾饷不能救，强暴不能御，陷于益贫益弱之境……即整个国家民族亦由是而贫于危亡。今欲起兹沈疴而图复兴，则非对此四病，药石并施，宽猛相济，内外加工不为功”⁵⁾。他的这个对国情的判断，与晏阳初在1933年（民国22年）时，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所作的判断，如出一辙。所以不能不说，蒋介石构想民族复兴运动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在二、三十年代积极从事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民族复兴运动以“新生活运动”⁶⁾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主要内容。在蒋介石提倡民族复兴运动之后，晏阳初在1934年开始强调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使命在于“民族再造”，这也不能不说是与蒋介石政府的相互配合。

1932年（民国21年），内政部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之前，派员赴各省视察，甘乃光次长视察了华北农村实验中心。其间，他用四天的时间考察了定县的实验工作，切实感到为了促进并加速定县制定的乡村建设计划的执行，有必要重建县政府机构。

同年12月，国民政府的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晏阳初、梁漱溟等从事乡村工作的人士也应邀参加。县政改革是这次内政会议的中心议题。甘乃光基于考察定县所得到的启发，提出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获得各省代表一致赞成。

全国内政会议的使命在于：“外侮日甚，如何作内政以寄军令，一以立国防之本，一以奠政治之基，并由此而发展地方自治的事业。”此次内政会议，经过六天的讨议，通过八项议案，在具体的运作方法上，有很多是采自定县经验的。如为了获得科学的县政改革方案，先在局部地区进行实验，产生切

实有效的方法。另外，确立地方卫生制度的及推行调查统计工作等，也是采之定县经验的。

1933年（民国22年）8月，内政部下令，在省政府管辖下成立实验县，从事乡村复兴工作。是年秋，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及山东邹平县、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等实验区先后设立⁷⁾。到1947年（民国26年）成立实验县的有江苏、浙江、山东、河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山西及察哈尔等十四省。这些实验县的成立虽说是来自定县实验的影响，同时也是政治力量推进的结果。

以前，晏阳初是以学术的立场去找教育的内容和建设的方案，做的是基础实验的工作。然而，这种由下而上的工作在定县进行了数年以后，他开始认识到：“欲将研究所得的（经验）推广出去，则非借助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研究与实施根本上是相异的，我们感觉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然后实施才可以行的通。政治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如单单研究，做几本研究的报告，则无需要政治的力量。倘要把研究的结果，施行于民间，使成为民间生活的改造，民间生活整个的一套要素，则非借政治的力量不可”⁸⁾。这时他甚至肯定地说：“中国整个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县地方政治”。可以说这是的晏阳初对于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平民教育与地方县政

固然，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县政改革的必要前提，但改革的直接对象毕竟实县政府，因此首先对当时的县政府作深入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县地方政治又处于怎样的状况呢？晏阳初如此概括当时的县政：“说到县政，在昔满清时代，对于地方政治还相当认真，所以那做父母官的县长，很多是进士举人，很多是有学问的人，清明的县长很不少。到了民国，就不注意这一点，政治非常乱，登庸已无制度，只要有朋友介绍，或者有党派关系，或者与军阀有缘，就可以去做县长。”⁹⁾而“旧的县政机构只有两种作用：一是‘催科’，管人民的纳粮上税，县政府成了收税机关；一是‘听讼’，为人民判案折狱，县政府成了司法机关。什么办教育，办生产事业，都是向所未有……如果催科不贪污，听讼不苛索，人民就认为这是好县长。不过这种清官是极难遇见的，利用催科、听讼以作发财捷径，这倒是正常。”¹⁰⁾县作为最直接与人民生活发生关系的基层组织，其政治已腐败到如此地步，即使研究实验出再好的教育与建设计划，也难实施与推广。所以，县政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晏阳初认为，改革县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

1932年，晏阳初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他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在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的同时亲自参加到政府机构中去，作改革政治的工作。试图通过“政治学术化”，“为研究实验上取得一种方便，其结果将（乡村教育与建设）引到又一阶段去，这又一阶段就是政府推进的阶段。”¹¹⁾所以，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是运作方式的问题，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除文盲，作新民”。我以为，这是在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不愿意走暴力革命道路的情况下，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社会改造手段。

晏阳初为推动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而要进行的县政改革。也就是说，他强调改革县政，是为了推动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实验运动若止于实验工作，那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值。”¹²⁾晏阳初所说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就是：把通过学术性的研究实验获得的具体办法，在“政教合一”，也就是“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的局面下加以推广。通过研究实验所获得的具体办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付诸实施而见更大的功用”¹³⁾。

这表明，晏阳初已经把县政改革看作是乡村实验运动能否达到最后目的之关键所在。换句话说，

县政改革已经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一环。而县政改革是否能够得以实施，成败与否，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科学的方法。第二次内政会议的召开及有关乡村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新规定的制订，使县政改革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与保证。此后，县政改革的具体实施则是以“政教合一”为原则进行地方政治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其目的在于通过县政改革来推广平民教育，最终改造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而县政改革的不成功只能说明当时在中国进行地方政治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县政改革的实施

全国内政会议结束以后，河北省政府率先于1933年春，成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院的构成与功能如下：

- 1，调查部 收集有助于制度、建设计划等制定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报资料。
- 2，研究部 研究乡村建设的政治、社会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再根据研究的结果制订执行建设计划的程序。
- 3，实验部 首先以定县为实验地区，检验建设计划和县政府机构是否合理。
- 4，训练部 为推行省的建设计划，培训行政和技术人员。

由此可知，县政改革属于研究院工作的一部分。鉴于平民教育运动已打下的基础和已获得的经验，研究院将院址选在定县。由省政府提名，内政部任命，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为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研究院中担任了相应的负责工作。同时，在平教会的工作也仍然继续兼任。可以说，平教会几乎承担了执行研究院计划的全部责任。这里充分地体现平教会与研究院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但他们各自都是有独立地位的。对于这一点，晏阳初十分强调，绝不暧昧。在谈到研究院与平教会的关系时，晏阳初指出：“平教会不是一个机关，乃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平教会与研究院在法律上、经济上没有关系，然而，在实际工作上却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¹⁴⁾。

为了保持自身独立的学术地位，而不被政府所操纵，不管平教会在经济上如何困窘，晏阳初始终坚持经费的独立核算。自己虽担任研究院的主席，但没有从政府处领取任何名目的薪金。至于河北省府在定县设立之县政建设研究院，在经费上与平教会毫无关系。平教会同仁在研究院兼职者也都是义务性质的，不从政府那里领取任何报酬。研究院属于政府机关，经费由省政府财政预算上来解决，虽每月经费仅有5,000余元，但平教会合法地参与其中，以学术的力量影响政治，可借助于其行政上的地位和有限的经费，发挥推进乡村建设计划的效应。

为了加强学术与政治的结合，平教会又于民国23年（1934年）4月，联合研究院组成了一个“学术讨论会”，由瞿菊农担任讨论会主席，每月举行一次谈话会，目的在于“以收互相切磋，彼此砥砺之效”。谈话会的宗旨是（一）培养学术兴趣，（二）交换工作经验，（三）建立共同思想¹⁵⁾。所以说：研究院使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成为可能。而定县则是“平教会与研究院的实验所”¹⁶⁾。实现了学术、政治与改革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对民众有利的地方政治制度与地方政府机构。晏阳初指出：“政治诚然是很重要，中央的政治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很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我认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¹⁷⁾。同时，他又明确了县政改革的目的——从消极处看，在于废除贪污苛杂；从积极处看，在于使这一政治机构从专事税收的政治机关转变为实施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政治机构。

县政改革工作开始以后，首先，晏阳初率平教会同仁对县政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根据

调查结果制订出改革方案：第一，改革政治组织；第二，培养行政人才。

晏阳初对县政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以为现在所做的县政改革与建设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其一，定要与乡村教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相辅而行，一面用教育力量改变人民生活习惯，构成改造的条件；一面用政治力量使一切环境有助于使教育发生效果。而且，他坚信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一但在全国真正应用，“农村建设以至民族复兴一定有一个光明，灿烂，伟大，宏远的前程！”¹⁸⁾然而，县政改革能否成功并非是由晏阳初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是否具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县政改革的终止

最初，晏阳初对国民政府的确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国民政府也对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视，并给予他们种种便利。但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研究院的经费越来越少，几乎“山穷水尽”。而且，随着国民政府采行保甲制度，加强控制地方，关于民众的组织工作竭力避免国民党外人士介入，更使县政改革举步艰难。

1936年晏阳初、梁漱溟曾亲自去见蒋介石，劝他放弃内战和一党独裁的政策，积极作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但并无效果¹⁹⁾。晏阳初无可奈何地说：“政府对于本会的工作向来也是非常同情与赞助的，并且十余年来，我们也曾多次与政府合作，尽本会的力量帮政府的忙。不过当此内忧外患，山穷水尽的时候，政府也碍难给我们经济上的助力。虽然如此，这种农村生活改造的基本工作迟早要有政府的经济后盾方能继续进展。”²⁰⁾

可见，晏阳初为了在全国彻底推行平民教育，对政府仍寄予很大的期待。但随着内外交困的加剧，国民政府采取“安内攘外”的政策，把主要的力量用在剿灭共产党势力和对付内部派系斗争及外来侵略上，越来越无暇顾及乡村建设问题。当初，在“民族复兴运动”时，提出的“管、教、养、卫”这一社会建设的计划也并未真正实行。正如晏阳初所指责的那样：“‘管、教、养、卫’是近年来政治改革的理想，而朝着这个方向去干的，至多不过做到一个‘管’……而教、养、卫的县政，茫茫全宇，那里去找啊！”²¹⁾。当时，所谓“管”，主要体现在保甲制度的强化上，国民政府通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了对户口及土地的管理和控制，使人民的生活，完全被纳入“剿共”与“加强治安”的轨道上去了。加之，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入侵华北地区，由于战争已迫在眉睫，平教会不得不全部从定县撤出。致使晏阳初经多年探索创造出的改造社会与建设社会的计划，随着定县这一基地的丧失而无法再继续实验下去。

晏阳初及同仁在定县所进行的县政改革是以与政府合作为起点的，又是由于失去国民政府的合作而难以继续进行。最后，终因侵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这说明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客观环境作保证的。一但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再好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也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内陆未直接受战争之害的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由地方的政府提倡开始实行县政改革和推进乡村建设。晏阳初率平教会凭籍他们在定县所得的经验前往协助。他不停地奔波于后方的实验县，继续推行他的县政改革及乡村建设方案。于此同时，他又于1940年，在后方四川北碚歌乐山建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作为为乡村建设培养行政与技术人才的基地，旨在为实现和平后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准备人才。这也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机构。但1938年起，日本的军事入侵继续向后方延伸，四川的很多地方都遭到极为严重的轰炸。人们失去

正常的生活秩序，到处都处于恐慌的状态。战乱使已迁往四川北陪的平教总会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共之间内战又起。在中国的土地上，战争一直持续的1949年。虽然，抗战结束后，在晏阳初奔走下，利用美国经济援助款项，于1948年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希望正式由政府的力量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之后，由于政权的更替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晏阳初只得离开中国。近30年的探索所积累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经验也被“彻底”地扬弃。一段历史被人为地割断，对于其中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去做认真的借鉴与继承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民族的悲哀！

但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并未就此销声匿迹。晏阳初开始亚洲、非洲、南美各州的贫困、落后地区继续推行他经过几十年从事平民教育实践而总结出的四大教育。平民教育运动，由个人的、局部的、地方的运动，演变成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以致于成为世界性的运动，充分显示了平民教育在社会改造与社会建设中的生命力和重要意义。

纵观定县实验，主要从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方面的，即平民教育制度确立的工作；一是政治方面的，即县政改革的工作。从学理上讲，晏阳初所从事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尝试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进行社会改良的系统工程。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说“县政改革”始于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止于政府的消极与制约。纵观她的推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建设，学术与政治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密切关系。教育固然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但以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毕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教育改革必须与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条件与环境。

注

- 1) 毛应章《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1933年南京刊)的自序中记载：晏阳初氏于去年(1931年)3月下旬到南京。蒋委员长选派中央军校教官五人，武岭、遗族二校教员各四人共组一“平民教育研究团”赴定县实际考察。4月16日起程北上，月余始返。抵定一周后，张学良又派来十三人，共同考察。
- 2)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J]1933年(民国22年)11月14日讲，《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出版社，1961年(民国50年)版，第727页。
- 3) 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J]1932年(民国21年)6月6日讲，《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出版社，1966年(民国55年)再版，第588页。
- 4) 《蒋总统集》[M]第一册，台北出版社，1966年(民国55年)再版，第583页。
- 5)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J]1935年(民国24年11月)，第15~116页。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28)第25编“十年建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民国75年)，第7版，第116页。
- 6) 参考：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新生活运动史料》1975年(民国64年)12月。
- 7) 中央委员李宗黄，曾任江宁实验县设计委员会中央指导员。1934年(民国23年)5月，李与江宁县党部，县政府所派各员，共七人，组成一个社会教育考察团，以千余元之经费，用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菏泽、邹平、青岛、定县、无锡、昆山、上海等七处。之后编辑了《考察记实》，于1935年(民国24年)1月，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 8) 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J](1935年10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
- 9) 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J](1937年11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34页。
- 10) 晏阳初“农村建设要义”[J](1938年4月)《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 11)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J](1937年)《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64页。

- 12)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J](1937年)《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
- 13)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J](1937年)《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64页。
- 14)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J](1934年10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 15) 《民间半月刊》第1卷1期,1934年(民国23年)5月10日,第35页。
- 16) “平教会本年度参观周”[J]《民间半月刊》第一卷1期,1934年(民国23年)5月10日,第38页。
- 17) 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J](1935年10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91~392页。
- 18) 晏阳初“中国农村教育问题”[J](1947年10月)《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0页。
- 19)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M],漓江出版社,1996年9月,第312页。
- 20)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J](1934年10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5~346页。
- 21) 晏阳初“农村建设要义”[J](1938年4月)《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